

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

第九期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日

目 录

坚持浙南十五年斗争的回忆(续).....龙 跃(1)

抗日战争时期

六、红军挺进师改变番号、集中训练与出动抗日

从平阳山区到江南水乡.....施光华(10)

忆林夫兼记浙南往事.....连 珍(15)

永加县党组织发展情况.....永加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21)

动态两则

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

第九期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日

目 录

坚持浙南十五年斗争的回忆(续).....龙 跃(1)

抗日战争时期

六、红军挺进师改变番号、集中训练与出动抗日

从平阳山区到江南水乡.....施光华(10)

忆林夫兼记浙南往事.....连 珍(15)

永加县党组织发展情况.....永加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21)

动态两则

坚持浙南十五年斗争的回忆（續）

龙 跃

抗日战争时期

六、紅軍挺进师改变番号、集中訓練与出动抗日

我们同国民党第二次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后，原红军闽浙临时省军区所属的红军挺进师和地方武装人员便陆续在平阳北港集中。因部队原来活动的范围比较大也比较分散，兼之，粟裕同志在北面也跟国民党遂昌县政府谈判过一次，然后把坚持浙西南斗争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集中起来，再带到平阳。因此部队集中的时间拉长了一些，从八月初开始到十月中才集中完毕。接着，就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部队编为四个中队（其中一个教导队），后来又成立了一个新兵队共五个中队。正式宣布部队改变番号时开了全体大会，由我担任大会主席。刘英、粟裕同志讲了话，说明部队改变番号的意義，要大家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保持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服从命令听指挥，加紧训练，准备开赴前线杀敌。本来，我们的帽徽是红五角星，这时每人发的新帽子是“青天白日”的帽徽。我在大会上说：“我们原来的红五角星帽子是光荣的，现在改变番号换上这顶新帽子，是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但我们光荣的革命历史和传统不能忘记，大家把红五角星帽子好好保存起来，不要丢失了”。全场热烈鼓掌表示赞同。我们在与国民党谈判之前，特别是在第二次谈判开始时，就在部队与土作人员中反复进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做得比较细，所以部队改变番号也就比较顺利，没有发生什么思想不通的问题。在这次大会上，全体指战员精神饱满，“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坚决执行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等口号，响彻整个会场。

部队集中后的首要任务，是抓紧时间进行军事政治训练，提高指战员的军事政治水平，以利在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更好地保持和发扬过去十年艰苦卓绝斗争的革命传统和游击战争的专长。部队由开始集中到出动抗日以前，军事政治训练都抓得很紧，每天三操两讲，有时还搞军事演习。因此，政治水平和战术、技术都提高得很快。

抗日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的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每一个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特别是负有一定领导责任的党政军干部，如何重新学习革命的理论 and 党的政策，如何正确认识民主革命战争所赋予自己的特殊使命，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能够适应新的历史情况的发展和变化，这是当时每个同志都渴望解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领导上必须抓紧时间进行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因此，从部队集中到出动抗日前的这一段时间，省委和总队部除了加强对部队练兵的领导外，粟、刘两位首长还亲自主持开办了三期军政干部训练班。

第一期干训班学员二十多人，以军队干部为主，训练时间十天左右。第二期干训班学员十四、五人，都是浙西南的干部，时间半个月左右。第三期干训班学员十七、八人，都是浙南的干部，时间也是半个月左右。这三期的学员，都是部队和地方上比较负责的干部，军队是连队以上、地方是县级以上干部。第一期干训班我参加了一段时间，后因公外出，没有参加到底。第三期干训班我是班主任又是学员。这一期粟司令员在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所有课程全由刘英同志主讲。这三期干训班的教学内容，基本精神都一样，总的是三个大题目：一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系；二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关系及其重要性；三是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内容和相互关系。这三个问题都很重要，都是我们要下工夫学懂的。那时，我们干部的阶级立场都比较坚定，就是文化水平低，理论水平更低，因此学

习时困难就比较大。譬如在学习第一个问题时，什么叫矛盾也不懂。记得还是粟司令员讲了个故事：“古时候有个卖武器的人，既卖矛又卖盾。他夸耀自己的矛对什么盾都穿得通，简直是无法抵挡得了的。他又吹嘘他卖的盾是什么矛也穿不透的，是最坚固不过的。旁边有个人不服气，出来‘将’了他一军，问他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何？’他哑口无言”。这样，才给大家开了窍，简单地懂得了矛盾就是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面，不论是民族矛盾还是阶级矛盾，发展到对抗时，就要爆发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就是要灭亡中国，中国人民除了少数汉奸卖国贼外，各党各派各军各界都不愿作亡国奴，主张“枪口对外”，联合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把它赶出中国去。所以民族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然后，我们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省委编印的一本有关中央重要文献和负责同志重要文章的书）中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共产党员必须是爱国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又必须是民族战争论者。我们的口号是反对日本，保卫祖国，为祖国而战，为民族独立而战，只有民族得到了解放，国家保持了独立完整，才能谈得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问题。”才算把这个问题弄懂了。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求进步之心很切，上课时大家都认真听。我和另几个同志还学点政治经济学。讨论时发言非常热烈，从“辛迪加”、“托拉斯”等陌生古怪的名词直至党中央的政策、路线，只要有不同意见，就展开争论，往往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吃饭时端着饭碗也还在争个不停，直到把问题搞懂为止，这是当时学习中的好现象。凡是经过干训班学习的同志，政治、理论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这对于后来我们在新的环境中开展工作，在浙南坚持艰苦的斗争，是有很大帮助的。

在第一期和第二期干训班之间，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闽浙临时省委在凤林村召开了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由粟裕同志作抗战形势的报告，刘英同志作三年游击战争最后八个月的斗争总结和部署抗日战争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除省委委员外，

有部队连队以上干部和地方上一些县级以上干部，温州地下党也有两位同志，一为学生支部的代表，一为工人支部的代表来参加。

考虑到将来斗争的需要，解决干部不足的问题，闽浙临时省委还以“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的名义，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初到三月中旬开办了一个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校办在山门街畴溪小学，所以又叫“山门救亡干部学校”。学员两百多人，大部分是温州各中学的在校学生，还有从处州、台州和上海来的大、中学生。校长由粟裕同志兼任，付校长黄先河同志，教育长黄耕夫同志，教员有孙克定、张忍之、陈雨笠、宿士平、林国挺等同志。四门课程：哲学、政治经济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游击战术。粟裕同志亲自兼课，讲游击战术。刘英同志也经常到校讲话。记得张山阳同志也在干校讲过课，张贵卿、张崇文同志也到过山门干校。学员的学习情绪很高，很活跃。除了听课和军事训练外，还经常到附近农村作群众工作。后来还组织了一个巡回演出团，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平阳及附近几个县进行宣传演出。

我们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政治影响很大，国民党很注意我们这个学校，特务机关还派遣了一个叛徒，也就是后来破坏浙江省委的特务陈家璧混到救亡干校来，收集我党我军情报，企图暗杀我党我军的领导人。不久，经过学生的检举，就被我们破案了，从他的行李中搜出了两把匕首，立即驱逐他出干校，并公开登报揭发。这件事充分说明，国共两党虽已在全国合作共同抗日，但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国民党顽固派转变了他们的反共方式，用特务政策来对付我们。

救亡干校只办一期。结业后，一部分学员分配到部队，在政治处的领导下组成一个政宣队，共有二十四、五人，队长为陈雨笠，随部队到前方工作。大部分学员留下来，由省委分配到浙江各地的公开和秘密两条战线上工作。有不少同志今天都成了党的负责干部，如交通部付部长程望，军事艺术学院的林谷，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董南才，江阴造船指挥部的易丁，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马朝芒，以及现在浙江工作的邱清华、徐寿考、周飞等同

志，还有作家林斤澜(鲁林杰)同志也是从山门救亡干校出来的。

一九三八年初，新四军军部两次来电报催调我们的部队到皖南集中。因为上年九月底我和吴毓同志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那一次，博古同志对闽浙临时省委和刘英同志曾写信交代过，没有他的亲笔信，部队不能调动，而这时候八路军办事处和博古同志又没有来信。所以，省委于二月中旬派我和余龙贵同志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请示部队今后的行动问题。我们经过南昌，在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得知，新四军军部就在南昌高家巷。办事处主任涂振龙带我们到军部去见付军长项英同志。我们向项英同志扼要地汇报了浙江红军部队集中训练和游击根据地的地理位置等情况，还谈到我们带着刘英同志给博古同志的信，要到武汉去。这时，项英同志正要到长江局去开会，他说：“刘英给博古的信由我带去好了，你们不必去武汉，在南昌等我回来再说”。我们在南昌耽了十多天，其间我们去了军部供给部长宋裕和同志，他是从延安派到新四军来工作的。过去在中央苏区时，他与粟裕同志很要好。去年九月我同吴毓同志在南京向博古同志汇报时，说到部队大体上都集中了，就是粟裕同志和他带的部队还没有回来，还继续派人在找。因此，党中央对粟裕同志的安全很关心。这次我和余龙贵同志向项英同志汇报时，首先就汇报了粟裕同志在浙西南坚持斗争，安全无恙，现在他已回到省委和刘英同志在一起，正在加紧培养干部和训练部队。军部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宋裕和同志对我们说：“毛主席已回了电报，他知道粟裕同志平安很高兴”。可见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南方各根据地的情况、特别是对高级干部的情况很关心。这是很自然也是有道理的。抗日战争必将是一场十分艰苦、十分残酷的战争，没有更多的红军部队作为中国抗战的中坚力量，特别是没有一大批有领导能力和作战经验的高级干部来指挥这场战争，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不可能的。之后，我们又到军部副官处看了副官长，他给了我们每人一付新四军的臂章和符号，军衔是中尉副官。这是我第一次顺便当了一个“官”，可惜这个符号我后来遗失了，不然的话，倒很有纪念意义。

项英同志从武汉回来后，对我们说：“浙江部队的编制、集中地点以及今后浙江工作的安排，长江局和东南分局统一了意见，作了专门决定。东南分局决定派组织部长曾山同志同你们去浙南，向刘英、粟裕传达。”于是我们于二月底，护卫着曾山同志，一起回到了平阳北港。

曾山同志的名字，我在中央苏区就很熟悉，知道他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是一位斗争历史很长的高级领导人。只是那时我在主力红军中，他在地方上担任领导工作，我没有见过他的面。在回浙江的前一天上午，我同余龙贵同志去看他，并向他简单汇报了浙南游击根据地 and 部队的情况，他听了很高兴。曾山同志为人忠厚朴实，待人诚恳热情，没有架子，像老大哥对小弟弟一样对待我们。他身材高大，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很威武。国民党军警对他都很注目，以为他是从北方来的一位大军官。一路来，我们很喜欢同曾山同志闲谈，总想从他那里多得到一些教益。当谈到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的问题时，曾山同志说，红军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王明路线造成的。如果不是毛主席被排挤，由毛主席来领导，红军不但不会离开中央苏区，而且会象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一样打败蒋介石。曾山同志还谈到他是怎样到苏联去学习的一些情况。我说：“你是主力红军已经长征、中央苏区失败之后，奉组织之命才离开那里的。你在那样严重的环境里坚持斗争，真危险真辛苦呀”。他说：“我不辛苦，你们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才辛苦哩！”接着，他问我们是怎样从江西打到蒋介石的老家来的。我讲了挺进师的组成和胜利到达浙江以及在浙江建立游击根据地的经过。他说：“我在莫斯科经常听到你们在浙江的消息，苏联《真理报》曾有过报导，用老大的字登载你们在浙江打胜仗的消息”。苏联，那时候在我们的心目中是革命的圣地。听了曾山同志这些话后，我更觉得苏联真了不起，连我们在浙江打游击的消息也知道，还登在《真理报》上，这是从来未曾想到过的。我感到很光荣，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一路上，我们本应是曾山同志的保卫者，可是曾山同志却处处照顾我们，真使我们不好意思。记得从南昌回浙江的那一

天早上，我们从办事处到了大街上，我去喊黄包车，因为缺乏经验，将随身带的小皮箱随手放在马路上。曾山同志却一声不响，走去站在皮箱旁边，等我喊车子回来，他才把箱子交还给我。曾山同志这种谨慎、朴素、谦虚、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的品质和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部队自一九三四年七月离开中央苏区以来，特别是在一九三五年怀玉山突围以后，一直没有见过中央领导同志。这次曾山同志来浙南，部队上上下下都高兴极了。曾山同志到达时，粟、刘首长率领部队干部、战士和救亡干校全体学员，排列在山门街外的道路两旁，吹军号、放鞭炮，夹道欢迎。曾山同志在根据地住了一个星期左右，与刘、粟开过多次会议。据我所知道的，他除了谈目前抗战形势和党中央对南方游击根据地的指示外，对我们部队和浙江的工作，主要传达了三条，大意是：（1）浙江红军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七团队，集中地点为皖南泾县章家渡，部队应及早出发；（2）浙江地位重要，原来的游击根据地不能放弃，要留下一些人在浙南继续坚持；（3）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撤消原闽浙临时省委，成立浙江临时省委，待中央批准后为正式省委。原来省委两位主要领导人，一个带队去前方，一个留下继续领导浙江工作。经刘、粟交换意见后，确定粟去前方，刘留在浙江。

我回来在部队中说起曾山同志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曾山同志在苏联学习过两年，去年才回来，于是大家要求他作目前形势和在苏联见闻的报告。曾山同志很谦虚，开始不肯讲，因为大家要求殷切，他才在救亡干校大礼堂向干部和学员作了一次讲话。谈了抗战形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谈了苏联的情况。他说苏联农村已普遍建立集体农庄，重工业很发达，他在莫斯科被邀请到红场观礼，看过“五一节”红场的军事检阅，红军很强大，装备尽是新式武器，他说我们中国红军即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也会强大起来。他还说到他和另外两位领导同志一起回国前，斯大林同志接见过他们。斯大林对他们说：“中国革命已经走向高潮，你们回去要跳到高潮中去游泳，但要当心不要被水淹死了”。曾山

同志还讲了许多对我们鼓励的话，我们听了很受教育和鼓舞。

经过曾、刘、粟商量，几个大问题定下来以后，有关今后浙江工作的安排和其他一些问题，还需要刘英同志亲自到东南分局去汇报，并接受指示。三月上旬，刘英同志随同曾山同志一道去南昌，省委的工作暂交给我临时负责，等他回来以后再做全面安排。

为了有利于今后浙江工作的开展，同时也为部队出动抗日尽可能地争取到国民党的一些援助，刘英同志经过金华时，与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进行过一次会谈。同去的有曾山同志和省委统战部付部长吴毓同志。刘英同志除告诉黄绍竑我们的部队即将开赴皖南集中外，还向他提出了如下建议和要求：

（一）为了照顾部队家属和处理今后我党我军在浙江的有关事宜，以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事业，建议在平阳设立一个新四军后方留守处，在温州设立一个新四军通讯处，在丽水设立一个新四军驻浙办事处。

（二）由于我军过去一直处在艰苦的环境中，物质条件很差，现在要开赴国防前线与日寇作殊死战，要求省政府发给我军五百支枪、十万发子弹和一千套军服。

此外，还把吴毓同志介绍给黄绍竑认识，以便今后有事好与他打交道。

这次刘、黄会谈对浙江统战工作的开展是有意义的。刘英同志提出的两点意见，第一点黄绍竑完全答应了，第二点只答应发给子弹五万发、军衣一千套。但据说后来没有发这么多。

一切准备就绪后，原红军挺进师除留下三个短枪班（浙南两个班，原浙西南一个班）和一部分干部外，主力部队五百余人由粟裕同志率领，在军民响亮的抗战歌声、口号声和鞭炮声中，在根据地广大群众热烈欢送与惜别声中，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由平阳山门街起身，向皖南进发，奔赴江南抗日前线（新兵连六十来人约迟一个月出发）。中途经云和大港头时，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专程从金华赶到丽水碧湖会见粟司令员，再由粟司令员陪同到大港头检阅我军，基本上实现了他和刘英同志会谈时许下的诺言，发给我军部

份军衣和子弹。部队经过遂昌时，与县政府共同召开了一个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部队到达皖南后，根据军部决定，又由第七团队改为先遣队，归第二支队建制。粟裕同志为第二支队付司令员。先遣队由粟付司令员率领，由皖南出发向南京附近挺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首战卫岗，打了胜利的第一仗，据说是粟裕同志指挥的。我们浙南去的这支部队参加了这次战斗。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军中人们称之为“老三营”的部队，就是当年浙南的子弟兵，它的前身是红军挺进师，也就是方志敏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领导赣东北农民暴动所创建的红军第十军的一部份。

（待续）

动态

永加县委邀请老同志召开 党史座谈会

为了抓紧开展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永加县委于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日，邀请当年在永加西、楠溪一带坚持斗争的徐寿考、胡国洲、谢用佐、谢顺兴、汪吉人、谢岩寿、谢明宋等老同志进行座谈。他们对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表示了极大的热情。经过四天半的座谈讨论，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史料。对“永加县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情况”、“瓯北的斗争与永乐人民抗日游击自卫总队”、“永加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大事记”等三个史料初稿进行了补正。并拟定十多个专题，准备会后分头组织撰写。

座谈会由永加县委付书记、县党史资料征集小组负责人夏士光同志主持。温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也派同志参加了座谈会

〔永加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供稿〕

从平阳山区到江南水乡

施 光 华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从水头街小学里传出了抗日战争爆发的消息，一时间镇上居民兴高采烈，有的人家点燃鞭炮，表示庆贺。消息是怎样得来的呢？原来是我党一位地下党员周饮冰同志，他在小学里任教，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一架破收音机。当他收到这个消息，就立即刻钢板油印出版《快讯》，到处散发。那时候在我们家乡，只是他有这样一架收音机，在我的记忆中，似乎连壳子也没有，是一架“散装”的收音机。人民群众多少年来，眼见国土沦丧，“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听说盼望已久的抗日战争真的爆发了，都抑制不住心中的热血沸腾。这一年，我在鳌江镇一布店当学徒，因为父亲病故后家中人手不够，未满师就回到家里。我们小学时期几位男女同学，有的已参加家乡的红军，并且已被组织上输送到延安，如林心平（即林秋侠）烈士，有的和红军干部有联系，在家乡还未正式参加工作（其中有周饮冰烈士的弟弟周亦航烈士）。我和四、五个同学，先后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和抗战宣传队活动。因为小时候看过高尔基、鲁迅、邹韬奋的小说和文章，又同熟悉的红军干部接触增多，于是我和好几个同学便在一九三七年冬报名参加了红军举办的“救亡干部学校”（校址在平阳山门街畴溪小学，校门口挂着“闽浙边红军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牌子）。

当时的山门街和凤卧村一带，是粟裕、刘英同志红军部队的根据地，现在回想起来，感到象“小延安”。我们生活在“救亡干部学校”，好象生活在延安的“抗大”和“陕北公学”。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和周亦航同志有着共同的经历——从参加当地抗战宣传队

到参加“救亡干部学校”，又从“救亡干部学校”到参加地方抗战宣传队。当时的家乡生活，在我脑海里留下了许多极为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还时刻引起我的幸福回忆。

在宣传队里，我们几个年青人不顾当地国民党区党部的阻挠和监视，脚上穿草鞋，身上穿的是用毛蓝布做的学生装，经常深入到平阳和泰顺县之间的大山区，向汉族和畲族老乡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大家不怕长途跋涉的劳苦，饿了啃几块随身带的地瓜干，渴了喝几口溪边清泉。有时行进在云雾缭绕的崇山峻岭间，只听到山下犬吠鸡鸣之声，却看不见山下的村落、田园和行人，好象人在天边行。行不多远，透过薄雾轻纱，脚底下原来就是阳光明媚的村庄，甚至不用高声喊叫就可以同村里的老乡说话。后来我在“救亡干部学校”，经常见到畲族同胞，有的肩挑重担稳步上山，有的在溪流中撑着竹筏顺流而下。他们当中，妇女都是大脚。干校的领导同志多次向我们介绍说，畲族女同胞为红军立过大功，他们背着红军伤员，机智地躲过白匪的兜“剿”，翻山越岭比男人还要快。

我们宣传队从深山回来不久，便接受红军同志的邀请，专程到凤卧村参加军民联欢会。我们甩开了国民党分子的监视，悄悄赶到凤卧村。一位农民装束的游击队领导人满面笑容地向我们迎来，红军同志向我们介绍说：“这位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悬赏捉拿的老海——郑海啸同志”。大约是在下午两、三点钟，全付武装的红军连队和手持梭标的赤卫队从四面八方村头山麓的露天会场汇集，会场上临时搭起了露天舞台。全村的男女老幼。逐渐地把席地而坐的红军和赤卫队围得水泄不通，几个顽皮的小孩在人群里乱窜。我第一次亲眼见到红军，第一次听到红军部队的歌声，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上下之间、军民之间水乳交融的情景。我后来决心参加革命部队，同这一次会场上受到的教育和启示有很大的关系。红军连队之间，红军和赤卫队之间，歌声此起彼伏，啦啦队也很活跃。会场上热气腾腾，军队和老百姓，一张张脸庞都是眉开眼笑的。这一切，都使我感到非常新鲜，非常亲切。我们在联欢会上演了几个什么戏，现在已经记不得了，无非是“一根扁担活捉鬼子”之类的小活

报剧，谈不上演技，但是人们都感到满意。

在“救亡干部学校”，我们学政治，学军事，学唱歌，做游戏，过得很愉快。栗裕同志给我们上“游击战术”课，带着我们爬山打野外，亲自指挥我们练习“行军中的防空”。虽然已经是冬天，有时中午太阳直射，天气显得也还暖和。我们也常趁着好天气利用休息时间在溪涧边洗洗衣被，洗洗脚，有时索性卷起裤腿泡在溪水里洗个痛快。山区的水清澈见底，顺着岩石和人们的双腿急湍地流，流到深处打几个旋涡，又慢慢地荡漾。深水里的游鱼象梭子一样地游来游去，看得清清楚楚。站在溪边转弯处，可以看到南雁荡山的奇峰怪石，家乡的山明水秀的自然景色，令人神往。有一天近午，我们正在班组里学习讨论，一位挑着货物进山，路过校门的老乡来找我。他是我在家乡水头街的邻居，当苦力为生，脸上的汗水蒸发着热气。他路过时恰好到了开午饭的时间，各班值日把饭菜都放在桌子上来了。一位红军战士（记得是身上围着子弹带、背着匣子枪的年青战士或警卫员，当时也有几个战士或首长的警卫员在班、排里学习）主动地借来碗筷盛来饭，爽朗地对他说：“老乡，一块来吃饭！”事情虽然很简单，我当时却觉得很新奇：我还未向领导报告，红军同志却抢先关心人，只要见到是基本群众，就这样的热情爽快，真是人民子弟兵，军民一家亲！我们一班八、九个人，吃的菜是一钵子虾皮咸菜汤，汤多菜少。物质生活虽然比较艰苦，但是大家心里却甜滋滋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这些一点一滴的日常琐事，都是增强我对革命大家庭思想感情的重要因素。

红军部队即将开赴皖南整编为新四军，“救亡干部学校”学习也就提前结束了。结束之前，我们和部队一起听过刘英政委的讲话。记得是在一座庙堂里，刘英同志披着一件灰色的旧大衣，向部队报告形势和任务，动员红军指战员正确认识“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为次要矛盾”的形势，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而取下军帽上的红五角星。西安事变时我们党力主释放蒋介石，今天又要取下红五角星帽徽，不要说红军战士的认识需要

有一个提高的过程，就是我们这些年青人一时思想也跟不上。刘英同志讲话生动风趣，部队里不时发出愉快的笑声。庙堂旁一位老乡从屋里端来一碗热开水请他喝，他用不很流利的语音模仿当地的闽南话说了一声“对姆起”，又引起了一阵欢笑。

“救亡干部学校”的200多名男女学员，有的随军到皖南和江淮抗日前线，大部分留在浙江各地坚持。当时我的同乡杨进（林怡）同志由上海党组织派到山门来传送中央文件，他根据上级的指示并经干校领导的同意，把我抽调出来同他到上海工作。我们离开家乡之前，为了筹划路费和多联系几个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员，又临时在平阳县政工队活动了一个多月。政工队的实际领导者是杨进同志。到上海之后，我由党组织分配到“江南抗日义勇军”。“江抗”东进经过夜袭苏州浒墅关和火烧上海虹桥飞机场等战斗之后，西撤北上，我又被调到“江抗”东路，即苏（苏州）、常（常熟）、太（太仓）地区的部队。苏常太地区是典型的江南水网地带，处处是湖、塘、河、浜，村村隔水相望，出门以船代步，有的村庄和人家，距离虽然只有一里、半里路，陆路上却要绕道走几十分钟才能走到。我们家乡是“青山横北郭”，山峦重叠；这里是“苍茫泽国东”，河川纵横。刚到江南时我还有点不习惯，总觉得一望平川怎么也见不到高山？！经过一年多的战斗生活，深感东路人民对我们的培育支援，觉得这是我们“第二个故乡”。

一九四〇年我曾经从常熟中心区被调到太仓边缘区工作。近年来从一些常熟、太仓的同志那里才知道，我的同学周亦航同志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也在太仓做过党的秘密工作。周亦航（周湛）同志一九四四年底曾经来看过我，那时我在苏北宝应新四军部队教导队工作。他不知从那里打听到我，直接来找我并且在我那里住了一夜。他告诉我，他要回到苏南敌后去工作。“人生何处不相逢”，我觉得他担负的是党的秘密工作，不便细问，但也为这次能在苏北根据地相见而感到高兴。我和周亦航同志是少年朋友，虽然从前交往并不很多，但是我从小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他虽然出身士绅家庭，但为人诚实厚道，不仗势欺人。我小学毕业后，因为家庭负担

不起学费，被介绍到鳌江一家布店去当学徒，他那时家庭经济可能也开始衰落，被送到杭州他叔父那里去读书，实际上也是当学徒。我从“救亡干部学校”到平阳县政工队，据说他后来也到平阳、于潜以及浙江省政工队做党的外围工作。常熟、太仓的同志向我介绍太仓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名单时，提到周亦航烈士。我恐怕同姓名的人多，不敢立即认定烈士就是我的同学。经过详细了解，才确知他就是平阳北港水头街的周亦航同志，周亦航同志原来也在太仓岳王市一带地方做过工作。他为党的事业在太仓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当时担负的任务和所处的环境，需要有十分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高度耐心负责的工作精神。他就是这样一位共产党员。我所认识的小时候的同学和“救亡干部学校”的同学，有不少为革命流血牺牲，他（她）们的英勇事迹有的已陈列在温州江心寺烈士纪念馆。我有不少熟悉的战友和领导同志，牺牲在常熟、太仓地区，他们的光荣事迹有的已经整理出来，有的还须待整理。我写这篇回忆材料，既是怀念我们的故乡、“第二故乡”，也是为纪念自己的同学、同志。每想起青年时代奋战在革命战争前线和默默无闻地为党的秘密工作而牺牲的同志、同学，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更加怀念我们的故乡、“第二故乡”。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于南京

编者注：施光华同志，原名温荣涛，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校训练部顾问。

忆林夫兼记浙南往事

连 珍

我是一九三七年冬在闽浙边革命根据地认识林夫的。那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平津沦陷，我从北平逃出，经过一番挫折，辗转南归，十月初回到温州。当时，闽浙边红军已与国民党谈判成功，在温州设立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州办事处，吴毓同志（已牺牲）任办事处主任。吴毓是我初中时代的老朋友，我到温州，他就到旅馆来看我，久别重逢，喜出望外。他告诉我，闽浙边根据地准备办一个抗日救亡干部学校，要“招兵买马”，希望我先回我的家乡乐清参加群众工作，然后再到根据地去。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同年底，他便约我一同带着七十多个青年学生，浩浩荡荡地从温州进入根据地的浙江平阳北港山门。我就是在这里见到林夫的。他是先我到达，还是在我之后才来的，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象见到久别的老朋友那样“一见如故”。原来我在乐清从事救亡工作时，就从野夫口中听到过林夫的名字，知道他是木刻家，还善篆刻，绘画颇有功力。野夫还指给我看过林夫的照片，那就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鲁迅先生在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与几位木刻青年的合影。在照片中，林夫那种全神贯注地倾听鲁迅先生谈话的神态，在我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初次见面，我对他却毫无陌生感觉的原因。

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就办在北港山门，处在群山环抱之中。校舍原先是一间小学的旧房子。林夫和我，同干校其他干部、教员一起，住在这房子左边的木楼上，大家都打地铺。学员二百余人，大都是来自温州在学的中学生，也有从处州、台州和别处来的。红军闽浙军区司令员兼中共闽浙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粟裕同志任干校校长，何畏（黄先河）同志任副校长。干校开设四门课程：哲学、经